



□李怀宇

陈寅恪先生在去世前一年,意识到自己的史学方法有可能失传于身后,对助手黄萱说:“我的研究方法,是你最熟识的。我死之后,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。”但黄萱敬谢不敏,后人颇有广陵散绝之叹。这个故事,相信触动了许多史家。谭其骧便心有戚戚,促成了他的弟子葛剑雄写出《谭其骧传》。虞云国也深有同感,日积月累而成《学随世转: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一书。

虞云国的专业是宋史。他进入大学时已年届而立,史学训练近乎零起点,以史学为志业意识却已然萌生。他师从程应镠,走上宋史研究之路。同时,补了两方面的短板:一是以“拿来主义”的眼光选读当年风行的史学理论与社科新潮的海外译著,二是认真研习中国现代史学大师的著作。历史学在史料处理、史实考据、史事分析与史著书写上,兼具科学与艺术的双重特性。虞云国曾设想:“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,从揭橥‘新史学’的梁启超开始,一个一个地把大师们的史学著作学习一遍,领悟他们的史学三昧,同时把他们的史学在大变局的互动中给以历史的定位。”这个设想虽未全面实现,但《学随世转: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一书写到吕思勉、陈垣、陈寅恪、顾颉刚、吴晗、丁则良、严耕望、刘子健、张家驹、程应镠等人,既关乎史家的世运,又再现前辈的风范,可见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侧影。

“历史永远在重作之中”是吕思勉的名言。他认为:“因社会状况的不同,人心的观念既随之而变,观念既变,看得事情的真相就不同了。史事的订正,又安有穷期呢?搜辑永无穷期,订正永无穷期,历史的当改作,即已永无穷期。何况历史不是搜辑、考订了便算了事的,还要编纂成功,给大家看,而看的人的需要,又是随时不同的,然则历史安得不永远在重作之中呢?”这让人联想到西方史学家克罗齐的论题: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”

吕思勉史学思想的基本原则是史学研究“不宜豫设成见”。这与马克思·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性的主张颇有相似之处。而吕思勉史学生涯的自觉追求是“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”。吕思勉在草拟《吕著中国通史》同时,也开始其断代史序列的宏大计划。据钱穆说,这几部断代史本来是吕思勉拟议中的“国史长编”。

吕思勉为《白话本国史》作《序例》说:“我很想做一部《新史抄》”,“把中国的历史,就个人眼光所及,认真真的,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,而又用极谨严的法子,都把原文抄录——有删节而无改易——自己的意见,只注明于后”。严耕望说:“有一位朋友批评诚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书。”这位朋友估计是牟润孙。此据杨联陞函:“牟润孙评述近代中国史学,而未提吕先生,弟致函指出,牟君回信只说嫌吕先生书多堆砌。”杨联陞不以为然:“试问有几人能堆砌如此广大而有意义?”严耕望附议杨联陞:“其实有几人能像他那样抄书?”更为吕思勉抱不平:“何况他实有很多创见,只是融铸在大部头书中,反不显露耳。”

1937年,胡适在日记中说:“寅恪治史学,当然是今日最渊博、最有识见、最能用材料的人。”陈寅恪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》说:“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,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,欲藉此残余断片,以窥测其全部结构,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,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,始可以真了解。所谓真了解者,必神游冥想,与立说之古人,处于同一境界,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,表一种之同情,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,而无隔阂肤廓之论。”这亦可视作陈寅恪的夫子自道。

陈寅恪心通王国维,作知己之言:“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,独于其平生之志事,颇多不能解,因而有是非之论。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,往往憔悴忧伤,继之以死。其所伤之事,所死之故,不止局于一时间一

地域而已。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。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,必非其同时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。”这是理解王国维的关键,也是陈寅恪的心史。

王永兴认为“陈寅恪先生史学主要渊源于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宋贤史学。”而陈寅恪认为“中国史学,莫盛于宋。”他肯定“宋贤史学的求真实、供鉴戒的史学思想”,“《资治通鉴》是为宋朝的治乱兴衰而作的,一定要用真的材料,存真理以为政治服务。”

陈垣和陈寅恪合称“二陈”,在学术上切磋砥砺。1940年,陈垣著成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,认为“此书舍陈公外,无合适作序之人”,便将油印稿寄给滞留香港的陈寅恪。陈寅恪在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序中说:“忆丁丑之秋,寅恪别先生于燕京,及抵长沙,而金陵瓦解。乃南驰苍梧瘴海,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,亦将三岁矣。此三岁中,天下之变无穷。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,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,南北相望,幸俱未树新义,以负如来。”陈垣的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“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、民族气节,不徒佛教史迹而已。”

陈垣的《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》则“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时事,觉此所谓道家者类皆抗节不仕之遗民,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。”陈垣更在《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》卷首语说:“呜呼!自永嘉以来,河北沦于左衽者屡矣,然卒能用夏变夷,远而必复,中国疆土乃愈拓而愈广,人民愈生而愈众,何哉?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艰苦培植而成,非幸致也。”当时正在抗战中,流寓西南的陈寅恪深有同感,《读哀江南赋》说:“古今读《哀江南赋》者众矣,莫不为其所感,而所感之情,则有浅深之异焉。其所感较深者,其所通解亦必较多。兰成作赋,用古典以述今事。古事今情,虽不同物,若于异中求同,同中见异,融会异同,混合古今,别造一同异俱冥、今古合流之幻觉,斯实文章之绝诣,而作者之能事也。自来解释《哀江南赋》者,虽于古典极多论说,时事亦有所征引,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,止限于论说古典,举其词语之所从出,而于当日之实事,即子山所用之今典,似犹有未能引证者。”

二陈治史,皆潜心史料,也留意时事。陈寅恪尤其善于从新视角去开发旧史料中前人所未用的潜在价值,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》说:“史论者,治史者皆认为无关史学,而且有害者也。然史论之作者,或有意,或无意,其发为言论之时,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,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。若善用之,皆有助于考史。故苏子瞻之史论,北宋之政论也。胡致堂之史论,南宋之政论也。王船山之史论,明末之政论也。今日取诸人论文之文,与旧史互证,当日政治社会情势,益可借此增加了解,此所谓废物利用,盖不仅能供习文者之摹拟练习而已也。”新闻是历史的初稿,“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”也有助于历史研究。

严耕望推许前辈史学四大家:吕思勉、陈垣、陈寅恪、钱穆。《学随世转: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一书也写了前三位,并有一篇写严耕望。史家如兵家,兵家有“兵无常势”之说,史家也有“史无定法”之论。严耕望在治史经验中说:“治史不能机械地拘守某一类固定的方法”,因为“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在史学上的运用也各有局限,不能特为万应灵丹。”

虞云国写到宋史专家刘子健,引为知音。刘子健在史学方法上有一段总论性阐述:“有人说史无定法。这句话没说清楚。研究历史的题材不同,当然不可能有呆板一成不变的方法。其实是史采佳法。说得更清楚一点,门道很多,因题制宜。再大胆一点说,因问求法。这不是佛教徒求法。假定说提的问题,一时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以采用,怎么办呢?答案是去找去,试用各种途径去寻求。科学家做实验就是这样的左试右试,就可能走出一条路来。”

如果说“史采佳法”,前辈史家的各门独家方法,后来者悟其精妙的一招半式,别出心裁地融会贯通,或许他日能存乎一心,自成一格。

□刘玉民

收到梁文博《诗意的栖居》巡回展济南展开幕式的请柬,我兴奋中带着几分惶恐:正当酷暑,气象台每天都在提醒大家没有急事不要出门,这时候搞美展行吗?开幕式当天下午三点的气温预计37摄氏度,我越发担忧,特意给梁文博发去微信说:这么热的天,那些老家伙们能来吗?这些“老家伙们”,其实也包括了。退休多年,我的确已经成了“老家伙”,早就给自己定下了恶劣天气不出门的规矩。

然而梁文博的画展开幕式我是不能缺席的,他不仅是我多年的好友,在我心中更是可以称得上“大画家”的人物。

当我走进画展大厅,却迎来了一阵愕然,一阵感叹:一百多人签到的巨大海报旁边众声鼎沸。原来,梁文博画展的热度竟然远远超过了酷暑高温!

梁文博是极具个性和追求的人,曾经因为好提不同意见被人视为“狂徒”。他曾经因为没能完成一棵老紫藤树的写生,一夜之间往返于济南市区和商河一个小村子;也曾经因为在火车上看到一个心仪的形象而提前下车,独自寻访了几天几夜。正是这种特有的个性和追求,成就了他的事业。他八次参加全国美展,多幅佳作被中国美术馆等单位收藏并长年展示。北京一家文化机构曾经投资数千万一次收购了他几十幅作品,还曾经在省美协与山东艺术学院任重要职务。梁文博始终保持一种温雅朴实、平易近人的作风;他重情谊,身上不时还透露出一股侠肝义胆的气息。

数年前因为乔迁新居而求画,与梁文博偶遇时随口说了情况,问他能不能帮忙。他回答得很干脆:没问题。但过了几个月没有了下文,于是我想他又要创作,又要带研究生,我的这点小事也许他已经忘了吧?然而忽然一天他打来电话,说他和夫人周末有空想来看我。第二天梁文博和夫人刘玉,一位端庄而又秀气的女士,开了两个半小时的汽车才好不容易走进我那个小院。这让我很受感动,由此也就成就了一位老作家与一位中年画家“忘年”又“跨界”的深厚友情。

时光荏苒,如今梁文博也两鬓花白了,但他的思维依旧敏捷,观念依旧新锐,画笔依旧纵横。我知道,心里多一点诗意,其为人、从艺、交友才能多一点“脱俗”。有了心怀诗意的画家梁文博,才有《诗意的栖居》,而《诗意的栖居》后面必定还有《诗意的奔跑》或者《诗意的歌唱》。让我们静候佳音吧。

【如是我闻】

史家的世运与风范